

· 经济观察 ·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逻辑与路径

钞小静，王 灿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又需要实现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互表征、相互反馈、相互转换，最终实现量质协同演化的高质量发展。从量质协同关系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笔者发现：在经济加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均有效提升，但是并未形成量质协同的正反馈机制；在经济减速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均面临下行压力，同时量质协同的负反馈机制逐渐显现；在转型发展阶段，面临经济转型与外生冲击的双重压力，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目标多元化难题，加剧了经济发展量质转型难度。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优化宏观政策，推动实现质量效益型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完善分配方式，提高消费需求质量；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增强国家能力，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质的有效提升；量的合理增长；量质协同演化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4)02-0003-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1]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质”通常是指经济发展的结构、效率，是发展的内涵价值；“量”通常是指经济发展的数量、规模、速度，是发展的外在表现。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一新提法凸显了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统一性，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面临的新变化，而赋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本文拟从量质统一视角阐释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关系的理论逻辑，梳理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演变的实践逻辑，探讨未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路径。

收稿日期：2023-12-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路径与对策”（22JJD790063）

作者简介：钞小静（1982-），女，陕西佳县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E-mail: chaoxiaojing1234@163.com
王 灿（通讯作者）（1999-），男，安徽凤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E-mail: 13675548517@163.com

一、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理论逻辑

如何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发展(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关于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关系的探讨,经济发展(增长)学说史上都曾给出深刻的见解。同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关系的讨论也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实践的重要视角。这些都为我们理解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关系的理论逻辑提供了借鉴。

马克思较早地构建了一整套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为我们理解新时代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2]认为,扩大再生产有两种类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是指在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和生产场所的扩大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是经济发展数量的增加;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是指在生产要素数量和生产场所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有对立统一关系,集中体现在相互表征、相互反馈和相互转换三个维度。

(一) 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相互表征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已有研究从理念革新、动能转变、结构优化和福利增进等多个维度对于高质量发展作出内涵界定并构建评价体系,为我们理解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视角^[3]。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以及评价体系构建不能过于泛化,并且不能忽视数量本身^[4]。面对现阶段中国经济新的发展环境和任务,一些学者开始呼吁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也要关注发展数量的问题^[5-6]。

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并不是对立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表征、相互影响。推动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是质的有效提升的外在表现,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是量的合理增长的内在路径选择。即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同时,其数量也会增加,同样,当经济发展数量增速减缓时,也说明经济发展质量的下滑,这具有统计意义的相关性。首先,经济发展数量的可持续性 is 经济发展质量的外在表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一定的增长速度为载体。高质量意味着高附加值,体现在产品或服务的附加特性和质量更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产业链向高端延伸,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7]。其次,在相同的经济发展数量水平下,不同经济体消耗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以及形成的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经济体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8]。最后,在政策实践层面,“合理”的经济数量发展的速度是“有效”的经济质量提升的重要评价方式。只有设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形成正确的宏观经济预期,地方政府才能将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创新水平和改善民生等工作中,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二) 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相互反馈

从演化的视角来看,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一类复杂的非线性反馈系统,实现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统一,在于形成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相互补充和自我强化的报酬递增机制。质的有效提升为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动力支撑,量的合理增长为质的有效提升夯实基础,最终实现量质协同演化的高质量发展。

1. 质的有效提升为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动力

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表征在于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技术水平、人才素质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如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从要素供给质量视角来看,由于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等性质,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走向收敛,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生的技术进步。当把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效率因素内生化于生产函数之中,就形成了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从资源配置效率视角来看,要素不断地从低生产率部门和地区转向高生产率部门和地区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促进了经济整体产出可持续

增加。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看,后发国家依赖资本和资源等要素扩张的发展模式具有局限性,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经济体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从而成功迈入发达国家行列^[9]。

2.量的合理增长为质的有效提升夯实基础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遵循“萨伊定律”,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等供给因素,不关注需求和消费的变化,因而也难以关注到经济发展数量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反馈机制。从反馈机制来看,经济产出数量的增加,带动了需求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对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形成正反馈。根据斯密—杨格定理,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水平取决于市场规模,进一步取决于购买力,即需求数量,由此形成规模报酬递增的循环累积机制^[10]。卡尔多—凡登定律进一步提出了需求和产出增长对技术进步的长期驱动效应。该定律认为,产出取决于外部需求的增加,经济增长是由需求引发的,产出增长引起生产率提升的原因不仅在于静态规模报酬递增,即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还在于动态规模报酬递增,即“干中学”效应和随着资本积累而嵌入的技术进步^[11]。

综上,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数量与质量的正反馈机制为“经济产出扩大→需求扩大”“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深化”“干中学→生产率提升→经济产出增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表明,有效需求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和长期经济增长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等一些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经历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这些国家(或地区)在阶段性转换时的供给因素并未发生大幅度变化,但是由于内部有效需求不足,没有形成有效的反馈机制,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经济发展数量与质量的正反馈机制需要一定的实现条件,从经济产出转化到市场需求规模扩大,需要合理的分配机制以及大国市场整合作为支撑。一方面,根据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收入较低的群体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较高的群体反之,因而只有公平的国民经济产出的分配机制才能形成更加有效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市场规模扩大和专业化分工深化也不是自发形成的,市场规模取决于大国经济的独特优势,地区产业专业化分工深化受制于市场分割的制度性阻碍。综上,从协同演化的视角来看,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要素投入,而在于不同经济变量之间是否能够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能够推动经济各要素相互适应和协调,进而实现更稳定、可持续发展。

(三) 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相互转换

依据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经济发展是有阶段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资源条件、外在环境和目标任务有所差异,因而经济体在每个发展阶段呈现特定的发展特征,并对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不同的要求。根据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划分,在经济进入准备起飞和起飞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资本投资拉动和工业化推动,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人民对生活质量的多样化需求驱动着经济转型升级。在发展战略选择上,在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其主要任务是从贫困向富裕迈进,为实现快速增长而推行赶超发展战略,通过增加基本要素投入推动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形成了粗放型的增长模式。随着经济发展进入高级阶段,一定程度的经济积累已完成,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发生新变化,因而经济发展战略将调整为更加注重质量并兼顾数量,实现从“数量追赶”的粗放型经济发展向“质量追赶”的集约型经济发展转变^[12]。

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看,从数量型发展到质量型发展的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实现经济质升量增往往面临体制障碍和政策约束,存在“惊险的一跃”。这需要对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结构作出全方位调整,促进各项改革系统集成。如果不能协调好不同经济转型政策之间的关系,经济体则会面临转型失败和经济失速的风险。例如,东亚新兴经济体在进行转型换挡过程中,未能正确协调好不同经济转型政策,进入了经济发展停滞期。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在从中等收

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过程中, 盲目推行福利赶超和新自由主义等一系列经济转型政策, 导致经济危机不断,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在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的转型过程中, 由于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 经济增长主体的行为博弈也发生了调整, 相应地要求经济增长政策也要作出调整, 其关键在于要将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微观层面的激励相容相结合。因此, 在转型过程中, 就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关系而言, 为了保证经济发展路径的延续性, 必须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 防止大起大落, 形成稳定的预期, 对市场主体形成有效的转型激励,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实践逻辑

从量质统一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 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之间依然遵循着相互影响、相互反馈、相互转换的理论逻辑。本文参考范欣和刘伟^[13]与任保平等^[14]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增长率, 与GDP增长率进行对比。由图1可知, 整体上, 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当经济增长速度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增长率的增速较快; 而当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下行阶段,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增长率也出现下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变化路径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征和运行逻辑, 具体可以划分为加速、减速和转型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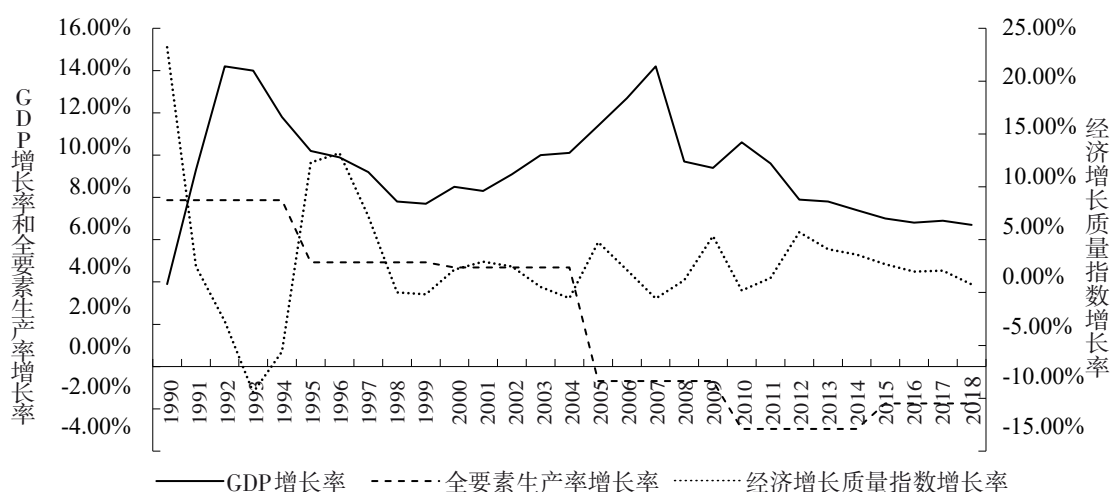


图1 1990—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增长率对比图

(一) 经济加速阶段：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

1. 经济发展数量的高速增长和质量的稳步提升

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高耗能的资源和大规模的投资等传统要素驱动。在劳动力层面,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和抚养比的下降, 形成了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在资源开发层面, 长期以来, 中国工业化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高能耗和高污染排放问题, 中国碳排放总量从1978年约15亿吨上升至2007年约70亿吨, 增加了近4倍; 在资本形成方面, 1978—2007年, 中国资本形成率上升到42%左右, 全国固定资产存量平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15]。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既包含了“汗水”, 也凝结了“灵感”, 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发展质量)有较大幅度提升, 主要原因来自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层面: 在体制改革层面, 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解放了各种要素资源, 使它们不断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部门转移, 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并突出表现为效率提升; 在对外开放层面, 中国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创

新，在进行设备投资和使用新资本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干中学”并产生知识溢出效应，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

2. 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未形成正反馈机制

在中国经济加速发展阶段，赶超发展战略驱动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让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有效提升，但是两者仍处于不协调状态，正反馈机制并没有形成。经济发展数量对质量形成正反馈机制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合理的收入分配和大国市场，这两个条件在中国经济加速发展阶段都未实现。在加速发展阶段的赶超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数量快速增长是由“资本积累+廉价劳动力”驱动，也形成了资本力量占据主导的分配方式，由此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滑，收入分配问题不断凸显^[16]；同时也形成了地方政府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地区间同质化竞争和市场分割的困境，庞大的数量扩张并未转化为市场优势，未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17]。此外，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不如要素投入。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等^[18]测算发现，1979—200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7%，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4%。综上所述，由于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未形成正反馈机制的增长路径，而是遵循着新古典经济增长中规模报酬递减的路径，因而经济的减速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经济减速阶段：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下行

1. 经济发展数量增速“换挡”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

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下行通道。除了受到外在冲击因素的影响，人口红利的消失、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的紧张也显示出之前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件条件正在消解，经济发展阶段从经济加速向经济减速转变。要素驱动的高速增长模式主要遵循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因而增速走向收敛是必然趋势^[19]。伴随着经济发展数量“换挡”，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也进一步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在内部资源配置方面，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鲍莫尔病”引致整体生产率改进速度下降；在对外开放技术追赶过程方面，随着技术水平与国际前沿趋近，“干中学”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下降，但自主创新机制尚未形成。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刺激性宏观政策的过度使用进一步加深了资源错配程度，降低了经济发展效率。

2. 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形成负反馈机制

在经济加速阶段，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并未形成有效的正反馈机制，而在减速阶段，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反而形成了负反馈机制，加剧了经济失速的风险。一方面，就经济发展数量对质量的反馈而言，过去中国经济发展采取了粗放式的数量赶超扩张策略，导致经济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仍然遗留诸多问题，政府对经济的纵向过度干预依然存在，而市场的横向竞争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导致了资源要素错配，损害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20]。另一方面，就经济发展质量到数量的反馈而言，经济发展数量高速增长背后的传统要素支撑作用不断减弱，而资源错配和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生产率下降，难以支撑经济发展数量的可持续增长，也难以形成新旧动能转换。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高峰期近30%左右的水平下降到了17%的水平，进而导致经济发展数量增速进一步下滑。

（三）经济转型阶段：经济转型叠加外生冲击

经济下行一旦形成负反馈的减速路径，便会形成路径依赖，需要强有力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才能完成新的发展目标和任务。近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经济发展动能结构转换，但是实际经济增速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经济发展同时面临着累积问题化解、新动能培育、经济转型阵痛“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同时面对内部结构转型难题和外部多重外生冲击，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目标多元化难题，加剧了经济发展量质转型

的难度。

1. 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面临多重外生冲击

现阶段, 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都面临多重风险挑战, 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 进入了“伴险增长”通道。目前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主要面临有效需求不足,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社会预期偏弱, 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问题。在国际层面,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正在发生重大调整; 全球货币超发和债务高筑形成了低利率—高杠杆并存的全球宏观经济治理危机, 全球经济复苏陷入疲软; 大国博弈进入关键时期, 中美经济科技脱钩风险加大, 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 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密集的多重外部冲击, 冲击的强度和频率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冲击不但影响了中国经济的供给和需求, 也打击了企业和居民的信心, 是造成“三重压力”的重要原因^[21]。

2. 经济转型叠加外生冲击下, 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目标多元化难题

在推动内部经济改革过程中如果叠加其他外生冲击, 政府主体会同时推行经济转型政策和应对外生冲击政策, 两大政策组合可能会产生“合成谬误”, 形成反预期效果。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 20世纪80年代中期, 日本为了应对《广场协议》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压力, 采取了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同时国内也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 以提升金融市场活力和吸引外资。这两类政策的出发点在于: 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刺激经济; 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复苏。当政策组合叠加时,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化自由化改革使得日本信贷扩张过于急速, 导致流动性过剩, 信用泛滥, 最终引发了房市和股市的投机泡沫, 后期经济泡沫破灭, 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事实上, 近年来中国在面对内部经济转型“难题”和外部冲击压力的政策实践中也面临相似问题。高质量发展内涵的丰富性、经济增速放缓导致风险暴露增多, 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多元化, 进而又带来了目标冲突、排序和权重设定复杂、目标虚化和预期管理困难等挑战。

三、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实现路径

经济转型发展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 发展面临的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 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奋进在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 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需要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 优化宏观政策, 推动实现质量效益型发展

现阶段中国生产函数正在发生变化, 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和配置效率发生改变, 面临的硬约束明显增多, 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接近上限, 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单纯数量扩张没有出路, 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只有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 以质取胜、不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才能支撑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在宏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 要遵循经济转型的基本规律, 在培育更多的新增长点、推动内部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 需要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基本要求。在政策实施上, 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 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在政策效果评价上, 要注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 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供给质量

无论是推动经济发展数量的可持续增长还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变革, 都需要在供给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不断提高供给质量。目前, 人民的消费能力和层次都得到大幅度提升, 但是供给质量并未有效跟进, 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产能并存, 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新变化。这既损害了资

源配置效率，也阻碍了经济发展量质正反馈机制的实现。因此，应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以自主可控、优质有效的供给满足和创造需求，具体而言：首先，发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作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其次，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方面，要改造传统产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等先进适用技术^[22]，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产出效率、经济效益，从而提高传统消费的供给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打造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以引领并拉动高水平的消费需求。最后，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中国产品竞争新优势。既要大力发展优质制造，推动工业品质量迈向中高端，还要优化消费品供给品类，推动消费品质量从生产端符合型向消费端适配型转变，实现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尤其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需要在深入推动数字技术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体系中，不断提高产品产业附加值^[23]。

（三）完善分配方式，提高消费需求质量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既是推动短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内需不足问题更是长期经济发展数量规模优势没有有效反馈到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堵点”。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制约在于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失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依然处于高位徘徊状态。因而应缩小收入差距，激发有效消费需求，一方面，要着力增加低收入群体创造财富的能力，保障其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另一方面，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完善税收调节机制，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加大转移支付。就关注的重点人群而言，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受各种制度性因素制约，为经济发展作出较大贡献但是收入水平较低，未能形成有效消费潜力，应加强对这一群体的就业保护，为其提供更多的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企业是经济系统的细胞。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培育做强足够多的市场主体，保持市场活力。当前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转型困境，民营企业承担着引领消费增长、稳定对外贸易和稳定就业的重要任务，可以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支撑。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还是国际新赛道的主要开拓者、科技创新的重要贡献者，可以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作出突出贡献。因此，应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首先，要提振民营企业的市场预期和信心。当前民营企业信心不足问题也主要来自经济下行压力、经济转型过程中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频繁的外生冲击。要保持稳定的政策供给和执行力度，更好地发挥政策风向标的作用，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全力帮助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其次，要形成有利于民营企业长期平稳发展的制度和环境。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权益，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激发企业家开拓创新的精神。最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相互扶持、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国有企业要充分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帮助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也要允许优秀的民营企业参与部分国有垄断行业（涉及国家重大安全问题的行业除外）经营，分享发展红利。

（五）增强国家能力，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实现机制在于：以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为主线的发展障碍破除与潜能释放和中国共产党在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指引下的执政作为，两者相辅相成。未来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

型,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高质量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创造和开发,形成大国市场优势。但是,目前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和经济转型发展都进入“深水区”,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需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推动力,主动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生产关系,有效控制外在冲击和经济转型带来的风险问题,在稳中求进中顺利实现经济改革和转型。区别于西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中国依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政策在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功能,要加强全局观念,防止顾此失彼,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系统优化。因此,面对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完善政策体系的谋划设计,明确改革方向,凝聚改革力量,应对改革风险,破解改革难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8-30.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
- [3] 简新华,聂长飞.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1978—2018[J].经济学家,2020(6):49-58.
- [4] 逢锦聚,林岗,杨瑞龙,等.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笔谈[J].经济学动态,2019(7):3-19.
- [5] 汪红驹,张馨羽.化解“三重压力”,促进经济发展质量与增长速度共同提升[J].财贸经济,2023,44(1):30-50.
- [6] 钞小静,王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1):53-59.
- [7] 刘尚希.稳增长应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J].财政科学,2023(1):5-8.
- [8] 任保平,钞小静.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家,2012(11):46-51.
- [9] 张来明.中等收入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做法与思考[J].管理世界,2021,37(2):1-11+262.
- [10] 阿林·杨格,贾根良.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2):52-57.
- [11] 李亚伟.卡尔多—凡登法则的新近争议考察[J].中国经济问题,2021(4):21-34.
- [12] 任保平.“十四五”时期转向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J].学术月刊,2021,53(2):75-84.
- [13] 范欣,刘伟.全要素生产率再审视——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3(6):4-24+204.
- [14] 任保平,师博,钞小静,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新中国70年经济增长质量的总结与展望[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58-59.
- [15] 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9,44(1):4-16.
- [16]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4):81-102+206.
- [17] 刘志彪,孔令池.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J].中国工业经济,2021(8):20-36.
- [18]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张平,刘霞辉,等.资本化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0,45(5):4-20+122.
- [19] 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56-71+206.
- [20]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张平,刘霞辉,等.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J].经济研究,2014,49(12):4-17+32.
- [21]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课题组,汤铎铎,刘磊,等.外部冲击频发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J].经济学动态,2022(5):3-14.
- [22] 任保平,李培伟.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3(6):1-10.
- [23] 钞小静,元茹静.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3,38(4):33-47.

Logic and Path of Effectively Upgrading and Appropriately Expanding China's Economic Output

CHAO Xiao-jing, WANG Ca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Summary: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eed to “effectively upgrade and appropriately expand China's economic output” of the economy, which highlights the unity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new changes faced by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y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sorts out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and explores the path to effectively upgrade and appropriately expand China's economic output.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is a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the two,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ree dimensions of mutual representation, mutual feedback, and mutu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practi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at during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both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been effectively improved, but the “positive feedback mechanism” of the synergy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has not been realized. At the stage of decelerating development, both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ace downward pressure, and the “negative feedback mechanism” of the synergy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is gradually emerging. At th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face the problem of diversified goals, exacerbating the difficulty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ectively upgrade and appropriately expand China's economic output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deepe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improve supply quality; improve distribution methods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onsumer deman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two unwavering principl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micro market entities; as well as enhance national capacity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ractical background o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tage,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unity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mutual representation, feedback, and transformation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is paper, based on a dynamic perspective of catching up with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nalyzes the relation and evolutionary logic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effectively upgrade; appropriately expand economic output; synergistic evolution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责任编辑: 徐雅雯)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4.02.001

[引用格式] 钞小静, 王灿.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逻辑与路径[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2): 3-11.